

現代化的真義

陳滿鴻

怎樣才算是一個現代化國家？到處高樓大廈、工廠林立、高速公路縱橫交錯、高科技生產、奢華的消費能力……。難道擁有這一切就能算是一個現代化國家嗎？其實，這些只可說是現代的表象而已。試想想：自然寧靜、充滿生機的原野變成了石屎森林；周圍充滿毒害人類健康的工業廢氣……。我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，換來的到底是什麼呢？在繁華及五光十色的鬧市中，又遮掩著多少城市的冷酷、罪惡、頑疾、疏離感和虛假的幻望？

中東因石油出口而致富，部族酋長有呼風喚雨的財力，但中東諸國不算是現代化的地方；非洲某國家建成差不多全球最宏大的教堂，但該國並不現代化；中國已擁有核子武器、導彈以及精良的作戰部隊，這些尖端科技足以使中國現代化嗎？

若單以「點」的層面來衡量，中國確已成就非凡：破了一項又一項世界性運動紀錄，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科技

瓶頸。自開放改革以來，大多數老百姓的口糧都一日比一日豐富，住房越來越寬敞，穿的衣服越來越講究。不過，與此同時社會的習性依然，黨的統治方式依然，人民在思想、言論及行動上的禁區範圍依然，政府與市民的關係依然……若果一個國家的理想及爭取的目標僅在於此，又何必耿耿於「現代化」呢？

原來現代化不是一個中性的名稱，它來自西方社會，其含義必然包括西方現代化背景。若中國只引進西方現代化的物質科技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現代化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我們把現代化限制在物質、科技的範圍，我們亦要探討究竟脫離了西方社會的法治精神、管理運作、經濟組織等因素，高水平的物質增長是否可能？

一、現代化現象發生在西方

Max Weber是第一位思考為什麼西方世界會脫穎而出的學者。按他的分析，資本經濟是西方社會全面理性化（Rationalization）的一環。理性化不是一個社會片面運作的特徵，而是在經濟、宗教、政治、管理、文化等各方面都趨附的大方向。Max Weber把資本主義視為西方在經濟領域上理性化的實例。所謂理性，可說名實相符，因為資本經濟的運作、生產及銷售原則是客觀地評估市場需要，以最直接、最有效的生產方式去滿足市場需求，從而賺取最豐厚的回報；再把利潤累積，按著所釐定的擴展計劃運用，確保競爭及財富優勢。在這理性化的運作過程中，意識形態沒有地位，成敗取決於客觀的市場資料、預

測及判斷的準確性以及有利的外在因素；對內方面則要具備有效率的管理、員工的積極性、妥善的生產及經營程序；而政府方面亦須提供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及保障；這樣，投資者才能作長線計劃。若沒有上述的操作精神，即使一個國家全面購入先進的生產機器，建設宏偉的工廠及生產線，也不可能提高物質生產水平！

在Max Weber的分析中，他把宗教因素也放在考慮之列，他認為基督宗教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的精神是相協調的，前者有利於後者的發展。基督宗教培養出有克制、節儉、倫理、勤力等質素的人，適宜於從事資本經濟運作。

我們可以結論出：現代化所要求的物質生產效率，唯有在資本經濟的精神及運作下，才能突飛猛進，而資本經濟的存在條件，卻有賴理性的社會運作模式、政治和法律保障、政府的恰當權力範圍及角色、私產財富觀念，甚至宗教精神等因素。

經過四十多年的驗證，中國終於走上了經濟開放改革之道，表示她已確認「大鑊飯」的操作不能提高生產力。她認識到唯一鼓勵人民積極性的方法，就是對市場需求作出靈活的反應，讓人民直接參與經營，並要求他們自負盈虧。換句話說，資本經濟的某些精神已在中國得到確認。但資本經濟的精神不能獨立發揮效果，它需要社會法律的保護及保證，使投資者有例可循，有可預測的風險率，資金及設備不致隨時隨地被沒收；政策不會貿然朝令夕改。資本經濟若要落實，國家政府需要相稱地克制，不能像封建時代的貴族那樣，以無上的權力隨時隨地調高稅率，並

隨時霸佔下屬的資產。簡言之，資本經濟只能在法治社會才有機會生根。

直至今日，西方仍是現代化的圭臬。何以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？何以其他地方未能踏上現代化之途？主要原因是西方具備了促進現代化的各種條件。中國若要躋身現代化行列，必須認真反省促進西方現代化的所有條件；這些條件都能夠是中性的，不必與民族個性掛鉤。假使我們斷定法治、理性及私產等觀念只適合西方社會，難道西方人在中世紀已有這些特徵？他們當時不是與中國的封建社會差不多嗎？到底誰決定且宣佈中國國情與法制、理性管理、甚至宗教等不相容？

二、現代化以理性運作爲骨幹

理性的社會運作，是所有現代化社會採用的管理方式：即政府與人民的關係，以致公營及私人所有企業，都以「層管」的方式去組織及管理，層管的原則是以法例及條文去取代人治，以機構公認的正式程序去取代個人任意的處事方式，在升遷、獎賞以及處罰方面皆有客觀評審標準，以取代公私不分的巴結關係。此外，機構中無論上上下下，都有基本上的監管，向法制負責，即使是最高領導人，也只能在固定的職務範圍中，按機構的法例向下屬行使指導或指揮權力。

相反，人治的運作偏重感性，領導人要求屬下「愛戴」、「忠心」、「支持」、充當「家臣」的角色；即是說，官員成了人民的父母，事事都可以「關心」，幾乎沒

有什麼事不能干預。作市民或當機構低職僱員，就是以整個人歸屬於領導者，沒有「聽命」的明確範圍。人治的必然後果，是養成屬下看風駛脛的本事。成功的下屬，需要如同昔日宦官一樣，能揣測領導者的意願，以搏取歡心使仕途順利。另一方面，屬下爭相奉承，久而久之把長官塑造成喜歡按個人意欲辦事的人。故在人治的社會下，必然朝令夕改，交職不銜接，勾朋結黨，走後門等風氣叢生。因此，要整頓的不是個人，而是法制；人治的社會運作製造出千千萬萬需要整頓的人。假使社會主義（或任何主義）的忘私及廉潔精神，能使人治的中國達到長期有高度操守的社會，那麼，中國便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例外，因為任何現代化國家都需要依靠法治制度去平衡人的墮落傾向。換句話說，現代化國家只需緊緊抓住建制的大方向，即使人性貪婪自私，社會亦會得到較健全的發展，並且有基本上的公道。若果一個政府身兼所有職務，既是公益的宏觀協調者、人民道德操守的監管者、又是企業的最主要僱主，不但孤苦老弱者由政府照顧，人民一舉一動都依賴政府，政府何來這麼龐大的力量？政府既兼顧不來，只有一方面去擴大監管的隊伍，另一方面也將事務積壓，拖慢社會的建設，等於阻礙現代化過程。

理性化運作的明確標記，是不論政府或機構，都以法制為本。在人治社會下，執政集團肩負全國人民的一切；而理性化社會運作，則是全國人民各司其職，分層管理社會建設，在執政黨的協調下，共同發展全國的一切；法制就是各階層市民能夠參與的鎖匙。事實就是。

三、現代化的具體指標：農業人口比率

社會學者常以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率，作為該國現代化階段的指標。全民務農的社會，必然處於現代化前期，因為它意味著每一戶僅生產足夠的糧食養活自己。美國立國時，農業人口佔全國近八成，而今天只佔百份之四；這百份之四人民生產的糧食，不但供應全國，而且更有剩餘可供出口。一個國家務農人口所佔比率越低，就表示其現代化階段越高。中國農業人口佔了全國的百份之八十，文盲或半文盲人口約佔三份之一；這客觀數字顯示，中國整體上仍稱不上現代化。當然，生產方式上的轉型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不能揠苗助長。若盲目地荒廢農地，只會加速水土流失；忽視規劃的後果，必是破壞及污染環境，打擊既有的農業成長，造成得不償失。

按中國具體的情況，仍需投資在農村生產及生活方式上，提高農業人口的知識、技術水平，使農民有機會適應其他行業；同時，農業人口減少亦必須與土壤改善及保護、提高生產技術等同步。目前，中國的現代化條件只可能在部份地區先落實，讓少部份地區或城市先邁向現代化。

四、現代人

現代化的社會需要有現代化的人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Alex Inkeles，於一九七四年作了一個龐大的研究（用了六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），其結論認為：一個邁向現代化改革的國家，其制度及組織建設，必須與國民質素的改變同步發

展，才能收到理想效果。現代人的特徵是能按程序處事，遵守規則，以客觀條件作判斷。在職務上服從上司是因為他的專業知識或技術經驗，而不是出於趨炎附勢。在機構中，僱員需要有合作及分工的能力，互相協調職責，分層清楚，人與生產成品分開。此外，現代人由於工作需要而經常搬遷，轉業能力靈活，不時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以配合不同的職務需要，避免人身因素與工作混淆。現代人最重要的特徵是強烈的適應能力，包括觀念、習慣、生活方式及居所等。

這些特質，都不是剛從傳統農村出來就業的人所具備的。Alex Inkeles 的研究發現，現代人的特質不是與生俱來，而是來自一個現代化的經營環境。換句話說，現代化（主要是理性的層管法制）的運作能塑造出具有現代化特質的人。

五、結語：教會的角色

從社會學的現代化標準來看，天主教會的內部組織及管理偏重傳統及不變。教會的經營通常不會考慮成本效益，倚重個人的獻身精神及情操，感性因素凌駕理性因素之上。梵二之後，教會開始了動態的世界觀，以及嘗試適應時代而作出內部革新。因此，教會也和整個中國社會一樣，正在邁向現代化。教會在組織及管理運作上，需要向現代化的社會學習；而教會能向現代化社會所提供的，便是她的社會訓導，使現代化的社會繁榮，能朝著公義及真正發揚人性尊嚴的方向前進。

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與都市化、理性化、工業化等因素相輔相承，而其中又涉及市民的適應，生活方式的改變，以及社會在管理、法治制度上的成熟。雖然西方不等同現代化，但現代化在目前只見於西方，也只有西方社會兼備現代化的各種條件。因此，西方社會的經驗始終可作前車，值得我們深入探究，不可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自我封閉。現代化的特徵是中性的，無分東西中外。如與西方的交流受阻，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一定會受到影響。



陳滿鴻神父：方濟會士，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社會學。